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著 任军锋 等译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政治学名著译丛

寡头统治铁律

——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寡头统治铁律

——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 著

Robert Michels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德)
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政治学名著译丛/胡伟主编)

ISBN 7-201-04140-1

I. 寡... II. ①米...②任... III. 政治社会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30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022)27307197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22.00 元

中文版序言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 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19世纪后期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意大利著名学者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 1858—1941)和维·帕累托(Vilifredo Pareto, 1848—1923)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1—1920)理论的影响下, 提出后来成为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分析原理——“寡头统治铁律”。该原理认为, “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结合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发展实践, 米歇尔斯发现, 即使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结果, 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从此, 米歇尔斯的名字就与“寡头统治铁律”这一引起广泛争议的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寡头统治铁律”也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论断。该论断成为后来许多学者分析官僚政治、组织行为、政党以及代议民主体制的主导框架, 从而奠定了米氏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内经典作家的稳固地位。由于都特别关注政治系统内少数人执掌统治权这一事实, 米歇尔斯与莫斯卡、帕累托一起, 被后来的研究者归入“精英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人物行列。

◆ 寡头统治铁律

1876年，米歇尔斯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城市科隆的一个有着法、德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接受教育，所以通晓三国语言，并在不同时期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写作。早在大学求学期间，米歇尔斯便成为德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成员，但他的工团主义立场使他对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工团主义者看来，仅仅通过参与议会政治并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为了赢得议会席位，社会党往往要做出过分的妥协让步，资产阶级立宪主义开始侵蚀到社会主义阵营对直接革命行动的信念，社会主义原则让位于政党本身的生存需要。因此，最好的办法只有通过工会激进的直接行动，发动工人总罢工，实现工人大众对工厂的直接控制。米歇尔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在帝国议会中赢得议席，致使其从当初的革命性政党转变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从组织内部来看，该政党日趋官僚化和等级化，组织本身由当初实现革命目标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维持组织本身的存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从外部来看，社会民主党日趋走向保守，最终堕落为德皇军事独裁统治体制的俘虏。

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趋势，米歇尔斯起初认为这只不过是德意志国家独特文化模式作用下的产物，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努力加以扭转。然而，米歇尔斯很快发现，这种趋势是任何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组织所无法避免的。对于一般性的组织是这样，即使对于那些宣称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党也难出其右：少数人最终凌驾于多数人的意志之上，党组织成立时期的目标成为少数人维持组织本身、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权威的牺牲品。可见，寡头统治是任何现代组织无法摆脱的“宿命”。

米歇尔斯的政治观点使他非但不能见容于当时的德意志政府,而且遭到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见的强烈反感,这使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获得学术职位(政府控制着大学教席的任命,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及社会主义者往往被打入另册)。于是,1907年,米歇尔斯被迫迁居意大利的都灵。在当时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的鼎力支持下,他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在意大利,米歇尔斯受到意大利著名宪法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时任都灵大学教授的加埃塔诺·莫斯卡及其“政治阶级”学说的影响。回想自己在德国社会党中的政治经历,米歇尔斯顿时萌生了写作一本政党社会学著作的强烈冲动。1911年,他用德文写成《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之后不久,该书的意大利文、法文和日文版也相继问世,在当时欧洲知识思想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①

1913年,米歇尔斯加入意大利国籍。虽然长期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教,但他一直将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祖国。墨索里尼掌权后,米歇尔斯应邀返回意大利,执教于佩鲁贾大学,并加入法西斯党,成为墨索里尼政府钦定的官方政治学家,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墨索里尼政府建立一门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也许正是米氏在法西斯党中的“历史污点”以及早年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激烈批评,使得我国国内学术思想界一直对他的思想要么讳莫如

^① 英译版对原书名作了较大改动,取名《政党:现代民主制度中寡头统治倾向的社会学研究》(*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此次汉译本采用德文书名,并将作者书中提出的核心论断“寡头统治铁律”作为主标题。译者斟酌再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明确地传达原书作者的主旨思想,而且清晰明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望文生义或误解。

深,要么退避三舍。这不能不说是国内知识界的一大憾事。

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米歇尔斯结合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切身体验,对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寡头化趋向的内在机理作了极富创见的分析,并由此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警示。虽然在一般人眼里,米氏的结论似乎“过于悲观”,但他向我们所展示的“问题”仍然切中肯綮、发人深省。而作者正是将“暴露问题”作为自己写作的根本出发点的。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本书无意提出一种‘新的体系’。科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创建某种体系,而毋宁是增进人们对问题的理解。既然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可言,那么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暴露出来’。社会学家应当……揭示……社会生活的基础。因为准确的诊断是提出任何可能救治方案必不可少的前提。”

领袖 VS. 大众:一种现代分野

组织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没有组织,现代社会空前复杂的利益结构便无法进入一个秩序的轨道。组织是现代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相互合作,采取共同行动和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政治领域,组织在帮助克服工人无产者由于力量分散而可能被敌人利用,使无产者获得对资产阶级的抵抗力和社会尊严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危险。在规模庞大的大众组织中,通过成员普遍参与的办法解决所有的组织内纷争,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机制上都变得不大可能。这样,代表制便应运而生。起初,代表是大众的“公仆”,他的一切行动都

受到大众意志的支配。然而,随着代表们所从事的事务日趋繁重,对个人的某些才能(如演讲才能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劳工运动早期推行的那些保障成员参与政党事务和工会管理的措施日见失效,并最终被抛弃。现代政治组织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开始走向分化,那些具有更高经济和社会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获得了更多进入领导阶层的时机。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受过特殊训练的由薪给职业领导组成的精英群体就此产生。组织的决策逐渐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具备的才能,这一权力被从大众手中抽走,集中于领导者之手。曾经只是集体意志执行者的领袖很快从大众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他们从当初大众的“公仆”变成大众的主人。

而且,领导者的权力往往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即组织的正式建制愈扩展和分化,成员规模愈大,财力越充足,组织领袖的个人权威愈不可动摇,组织内普通成员对组织的直接控制能力就变得越软弱。这样,一套刻板而且严格的等级体系随之产生。这一等级体系也成为作为战斗堡垒的政党机器顺利运行的必备条件。而代议制政府形式所宣称的大众意志的体现,实际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断篡夺权力的过程。

造成领导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分野的,除了上述结构上的动因之外,还有智识方面的根源。随着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智识上的鸿沟也开始拉大。领导者在智识方面相对于被领导者的优势地位,集中表现在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领导技能,而这些都是普通大众没有机会或动力获得的。对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无产阶级领袖而言,他们当初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已经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而对于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袖来说,他们往往通过无产阶级成

立的专门培训机构以及长期的领导实践,获得知识和技能,这使
他们与那些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领袖一样,获得了相对于普通
工人大众的优越地位,他们掌握了公共生活的所有技术细节,诸
如财政政策、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以及能够审时度势、及时有效
地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内部,政党
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必然走向分化,无产阶级队伍内部发生了
新的“阶级分化”。受到更多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训练的领导
者,其地位日益变得不可或缺。这种不可或缺性正是领袖强大
权力的重要来源。随着领袖及其附属集团特权地位的确立,其
生活方式也逐步与普通成员大众相分离,日趋走向资产阶级化。
而对普通大众来说,事业、家庭等私人事务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
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许多需要做出决断的公共事务只能激起很
少一部分人的兴趣,这就使他们在政治领域内常常表现出一种
普遍的无能状态,同时,也使领袖权威获得了理论上和实践中的
正当性依据。这样,“社会分工导致专业化。由专家担任领导是
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专业化意味着权威,正如
病患要听从医生的摆布,因为医生比病患知道得更多,他们对人
体健康和病灶有专门的研究。在政治领域,病患(大众)必须接
受领袖的指挥,因为后者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政治能力。”

与领袖与大众之间在结构上和智识上的分野相伴随的,还
有领导者心理上的根源:不可否认,并非所有获得名誉地位的人
都是些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事实是,那些在劳工运动初期担任领
袖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一旦获得权力,要想使
他们放弃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长期在位将使领导者的心理
状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权力的行使和对权力的意识,常常使领
导者变得日益自负,他们往往自视甚高,产生过高评价自己能力

的本能冲动。那种潜藏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指使他人的欲念在这种冲动的激发下,使得获得权力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势力均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敌意。对于那些缺乏其他生计来源的领导人来说,即使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会将领导职位紧紧抓住不放。对于他们来说,丢掉领导职位,无异于个人生活上的一场灾难。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政治事务的日益专业化,使得他们难以把握国家政治组织及其日益复杂的运行结构。再者,大众内部的利益分歧与情感差异使他们难以如同单个人或少数人集团那样行事。从群体行为外观看,大众常常得过且过、漠不关心,对新的政治状况反应迟钝,而如果没有来自外部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指点,他们便失去了基本的行动能力。这就给予了少数人聚敛权力的绝好机遇。而大众对那些代表他们心声的人往往心存感激,特别是那些在运动最艰苦岁月里曾带领他们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物。这些人被套上神圣的光环,并被赋予超人的力量。面对大众对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领袖们则将这种感激视为对自己使命之神圣性的肯定,他们赢得了大众的充分信任,不断获得连任,这就使领导职位成为他们当然的囊中之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在普通工人大众眼里,领袖常常属于“更为高级的人类”,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具有的特殊才能,只有他们才能引导整个工人运动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领袖也使自己日益变得不可或缺,只要发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们便以辞职相要挟,以退为进,借此巩固并强化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所作所为日益脱离大众意志的控制,与运动的根本原则相背离。

◆ 寡头统治铁律

而对普通大众来说,虽然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行为充满不安和尴尬,但仍然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袖,不能缺少在位者于其岗位上逐步训练出来的素质,而且无法及时找到能够取代该领袖的合适人选。

这样,无论从结构上、智识上还是心理上,领袖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在现代大众式组织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随着组织职能的专业化和运行机制的复杂化而不断拉大。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里,他们日益形成一个封闭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小型寡头集团。

预防寡头统治诸措施

寡头统治已经成为现代组织化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在限制领导人影响力、防止寡头化趋向方面,社会主义者们曾做出了种种尝试。

复决投票程序,即代议机构的立法提案通过与否必须提交全民投票表决,它是一项赋予公民直接立法的权力。在公法领域,这一程序在瑞士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在现代组织结构内部,这一赋诸成员集体投票决断的措施并未被普遍推行,而即使采用,也只局限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从不把党代会通过的决议交由全党表决,党代会上的决议只是根据简单多数的意愿做出。虽然该党规定,社会党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根据需要将任何动议提交党代会,但这种创制权实际上只是徒有虚名。成员提交的动议很少能够引起大会的注意,更不用说通过。况且,由全体成员直接立法常常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这就使得该权力几乎形同虚设。在意

大利,虽然复决程序曾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其效果并不让人乐观。在英国,许多工会组织曾长期采用复决程序,如今都均已放弃了这一做法。一方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复决程序影响了组织政策上的一贯性,而且耗费人力物力,不利于组织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在那些需要做出及时决断的议题上,复决程序往往会带来相当的不便。对于带领无产阶级开展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采用复决投票只能削弱其政治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大众在政治上经常表现出的无能(*incompetence*)也是推行复决程序的重要障碍。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甚至兴趣参与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干系的投票活动。而且,在缺乏一个负责任的官僚机构的情况下,投票结果很容易遭到歪曲;缺少生动活泼的讨论,投票结果将难以产生任何指导性的价值。实践表明,大众式投票很容易为那些长于投机的政治冒险家觊觎权柄提供机会,历史上曾有多少独裁体制都是建立在公民投票基础之上的:拿破仑一世、希特勒……。

对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考察,不难发现,该集团成员的出身无非来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而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集团的来源看,出身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往往占据相当的比例。在防止运动领袖寡头化倾向的过程中,不仅要求避免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化,而且,有必要实现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应当彻底抛弃先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的各项规章制度。巴枯宁曾指出,“如果一个成长于资产阶级环境中的人真诚地、自觉地希望自己成为工人的朋友和兄弟,他就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所有生活条件和资产阶级习惯,必须割断与资产阶级世界所有情感和智识上的纽带,抛弃资产阶

级的虚荣自负,与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并与之公开为敌,大胆而全面地向资产阶级世界宣战,毫无保留、全身心地投身到工人阶级的事业中来。”只有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革命者”:既没有属于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专属个人的事务;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情感、依恋,没有个人财产,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他的全部身心只在一件事情、一种思想、一种执着——那就是革命。只要无产阶级领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寡头统治便能够避免。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党的地方机构要求领导者应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普通的工人大众打成一片。为此,这些机构规定领袖们应断绝与资产阶级阵营的任何社会联系,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并禁止他们为资产阶级的报章杂志撰写文章。然而,实践证明,诸如此类的做法并没有使领袖与无产阶级大众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事实却是,双方的分野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壮大而不断扩大。

工团主义,是19世纪末从法国工会运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此后,工团主义理论迅速在意大利、西班牙、美、英等国家的工人中广泛传播,并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崇尚工人领导的革命方面,工团主义思想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并无根本性的分歧。所不同的是,工团主义者主张,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应当由工会或其他专门的工人阶级组织通过直接行动(如罢工或总罢工)进行。在工团主义者看来,由于国家从本质上是压迫性的专政工具,所以,任何企图通过议会活动或与国家达成妥协实现工人斗争目标都将事与愿违。工团主义者坚持认为,只有在工团主义中,人们才能找到消解寡头统治的灵丹妙药。然而,自身并未摆脱组织和代表制

原则的工团主义,如何能摆脱寡头统治这一普遍的社会学规律?难道工团主义的组织与一般的组织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吗?事实上,工会组织的结构与工人阶级政党的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分别。在工会斗争中,普通工人仍然需要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在工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往往成为许多人借以跻身政治界的跳板,组织工人罢工成为少数人捞取政治名声、加官进爵的绝好机会。这一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可见,所谓工人阶级的直接行动非但未阻止工人队伍内部的分化,反而进一步推动了领袖精英集团的形成。而且,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会组织,而积极参与工会斗争的人则更少。对此,工团主义领袖在态度上经常自相矛盾:一方面,大众往往漠不关心、得过且过,而且在智识上参差不齐,难以采取积极有效的集体行动,所以只有依靠少数人的事业心和果敢精神,才能成就工人阶级的伟业;然而,如果工团主义者公开支持这一看法,那么将意味着它公开支持寡头体制。

在早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在政治光谱上处于明显的极左派一端的当然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以及一切形式的强制性权威,向往完全基于个人和集团间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国家对于社会事务是一种多余的累赘,其存在主要是一小撮统治阶级对社会其他成员进行剥削和压迫。无政府主义者最早认识到国家和政党组织将必然走向等级制和寡头统治。在他们眼里,任何形式的权威即使不是万恶之源,也是通向奴役之路。正是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存在着相当的相似性,并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不难看出,与社会主义领袖相比,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心存更为高远的道德理想。但在实践中,无政府主义领袖与其他人一样,同样无法遏制

其内心本能的对权力的贪欲,不过,他们赖以统治的不是通过组织,而是通过思想,不是通过技术上的不可或缺,而是借助自己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政治上反对组建政党,提倡用临时性的协会体制取代政党组织,但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坚持组织原则,强调等级式管理和对权威必要的服从。在防止寡头统治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可谓用心良苦,但效果并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好。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能克服其树立的目标与可资利用的手段之间难以弥合的分野。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米歇尔斯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最玄妙、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并向人们承诺建立一种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将排除任何形式的集权现象。然而,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它始终对如何建立这一秩序的逻辑基础不甚了了。”

民主与寡头铁律

既然组织是寡头统治产生的基本动因,那么,被视为现代革命政党根本目标的民主(包括革命政党内部民主和国家民主)如何可能?革命政党将推翻现有集权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组建政党、开展斗争的主要目标。然而,革命政党本身却最终在类似国家组织的权威和管理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强有力的集权。革命政党在建制上变得愈来愈像政府,其领导人所凭借的手段与自己当初声称要推翻的威权国家毫无二致,政党组织成了国家组织“低效的微型拷贝”。维持组织本身的存在成了政党活动的目的,它有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日益脱离它所承诺代表的阶级,本身逐步演化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由此,米歇尔

斯对人类已经历过的社会革命并未给予肯定性的评价,提醒人们注意社会革命所潜藏的如下危险:即“它以一种秘而不宣并具有煽动性的、在平等旗号下追求自身利益的寡头统治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的公开统治。”

循着米歇尔斯的这一逻辑进路,一般的读者可能会以为,米氏对民主的未来必然抱持一种犬儒式的悲观主义。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米歇尔斯仍不失一个细心的观察者所特有的冷静客观。他指出,既然组织、领导以及管理是任何社会生活形式的必要组成部分,领袖产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不可或缺性,那么,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评价这种现象的好与坏,因为对任何政治、社会现象做出价值上的评断总是容易的。除非在纯粹抽象意义上,大众永远不可能进行统治。米氏认为,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要探讨的毋宁是: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时刻是可以实现的?民主是否和在怎样的程度上应当保持其纯粹的理想状态,它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致由于对未来充满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而盲目推行充满激进色彩的社会重建计划;而一旦当这种计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时,激进主义便很快转化为犬儒式的愤世嫉俗和浅薄的感伤情绪,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本书更进一步的目标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肤浅的有关民主的空想,这一空想始终困扰着科学的前进步伐,并将大众引入歧途。最后,笔者希望能够揭示出某些与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背道

而驰的社会学趋势。”只有坦然而且真诚地面对民主体制中的寡头化危险，我们才有可能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人类之所以选择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首先在于，与其他体制相比，该体制是邪恶最少的体制，虽然它仍然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尽管时有挫折，但只有在不懈的追求过程中，人类才有可能接近自己的“理想王国”。为此，米歇尔斯引用了一个极富启迪意义的寓言，以说明这一追求过程本身所隐含的深远意义：有这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农民临终前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他的田里埋藏着一块财宝。老人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找到财宝将那块田挖了个底朝天，但他们还是没有找到。然而，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却在客观上改良了土壤，最终使来年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这一传说中所提到的财宝就如同民主一样。

民主并非一件人们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财宝，而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过程中，在不懈地去寻找那些根本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劳动将在民主的意义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当然，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米歇尔斯由于受他当时所处年代、环境、无产阶级革命趋势以及其本人认识上的影响和限制，在对“寡头统治铁律”的整个论证过程中并非没有疏漏，例如，米歇尔斯未能分清技术专家与政治领袖本质上的区别；他的“寡头”概念显得过于宽泛，致使他以政党组织内民主的不可能性否定通过政党之间多元竞争实现民众控制政府的有效性和可能性等等。不过，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米歇尔斯对现代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洞见。或许，在许多审慎的学者眼里，这一理论过于“武断”。然而，或许一个片面的和具有挑衅性的论题，较之最为全面和审慎的概论而言，对于随后而来的研究和争论会有更